

## 荣耀先:信仰如炬 照亮征程

●本报实习记者 郝旭杰

踏入荣耀先烈士故居,院落中央矗立着的烈士雕像,目光坚毅望向远方,仿佛要将理想洒遍山河大地。

荣耀先,1896年出生于土默特旗察素齐普通的蒙古族农家。年少时,村里菜园有棵被村民奉为“神树”的大榆树,因树下积水被认作“圣水”,村民常舀水治病。他深知这是迷信,劝说无果后,毅然挥斧砍树——这份对愚昧的果敢宣战,早早彰显出他追求独立、崇尚科学的勇气。

1918年,荣耀先怀揣着对理想的憧憬,只身前往北京求学。在北京蒙藏学校,新思潮如春雨润苗,滋养着他的理想。“五四运动”爆发,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与同学并肩走上街头呐喊、宣传,激昂的口号声,是青年对国家命运的关切。面对校长达寿的极力阻挠,荣耀先毫不退缩,联合同学们展开斗争,最终将校长驱逐,以青春热血捍卫了新思想阵地,以无畏的勇气捍卫了追求真理的权利。

此后,荣耀先在革命的道路

上坚定前行。他受到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指引,他于192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像忠诚的播火者,返乡宣传、招生,引领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奔赴革命之路,创办学校、工读社,把革命思想化作种子,埋进草原的土壤。展柜里,他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与眼镜静静陈列,陈旧的书页、磨损的文具,仿佛还留存着他伏案钻研、为革命筹划的温度,见证着他以知识为武器,以唤醒同胞为己任的奋斗日夜。

考入黄埔军校后,荣耀先更是将热血与忠诚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毕业后在教导团历任要职,参与讨伐陈炯明、征剿杨希闵等战斗,每一场战斗,他都冲锋在前,毫不畏惧。1928年春,二次北伐中,荣耀先任突击团团长,山东运河战役中,他带队勇猛作战,突破阵线,陪敌重围,鏖战竟日,弹尽援绝,身中数弹,仍突出重围,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32岁。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荣耀先烈士的事迹鲜为人知。“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一切的英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979年奎璧、佛鼎等人对荣耀先烈士写的佐证材料。”讲解员吕莉莉说,“这些泛黄的书信历经波折,终于重现在世人面前。1982年,荣耀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人们看着墙上陈列的佐证材料,那一行行文字,仿佛是时光的密码,解开了那段沉寂的历史。它们见证了荣耀先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他的伟大与崇高。他从草原走出,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大业,用生命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守。

如今,墙上的照片、展柜里的文献,静静诉说着往昔。我们缅怀荣耀先,不仅是铭记一代革命者的热血牺牲,更是汲取那一份信仰之力。在新时代传承先烈精神,让红色基因永续相传、熠熠生辉。

## 李常有:铁血丹心映青山

●本报实习记者 贾思敏

泛黄的武川县光荣院档案册上,一行简单的记录承载着岁月的重量:“李常有,残疾退役军人,1988年5月入院,2003年9月27日病故。”当记者翻开这页被时光尘封的档案,一段关于忠诚与坚韧的往事,透过亲人的追忆和战友的零星讲述,逐渐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初夏的武川县三岔口村,阳光洒在静谧的院落。在李常有的侄子李润狗家中,记者聆听他对二爷爷的深情追忆。

“我二爷爷李常有,1917年出生在三岔口村。”李润狗的声音满是对往事的敬意。通过他的叙述,时间仿佛回到了1940年那个山河破碎的寒冬:日寇铁蹄肆虐乡里,暴行罄竹难书。“那年,二爷爷亲眼看见日本兵把一个才十几岁的娃娃残忍杀

害了!那场景,像烧红的烙铁,生生烙在二爷爷心上。”正是这切肤之痛与满腔悲愤,让青年李常有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从此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

“二爷爷干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李润狗说,李常有在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期间,遭到了日寇的疯狂追杀。为躲避搜捕,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躲藏在地窖中,度过了近两年暗无天日的时光。即便如此,日寇的报复仍未停止,他的家人遭受残酷迫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三岔口村,迁至上秃亥乡苏计村。

抗战胜利后,带着一身硝烟与伤病,李常有婉拒了组织的额外照顾,默默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三岔

口村,在阡陌之间躬耕一生,直至2003年以86岁高龄安然辞世,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

在武川县光荣院里,记者寻访到了与李常有同年入院的92岁退役老兵杨志生。提起故人,老人脱口而出:“李常有,常有理!”岁月沧桑掩不住那份熟稔的暖意,“他待人随和,大伙都喜欢他!”简单的言语,勾勒出了英雄最朴实的底色。

青山处处是丰碑。李常有的名字,连同战友口中那声亲切的“常有理”,永远镌刻在了故乡大地上。他将最深沉的爱与忠诚,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他和战友们一样,把个人的荣誉得失汇入民族存续的洪流,化作大青山下一座座用信念铸就、平凡而伟大的丰碑,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 西梁会议旧址:烽火帐篷 丰碑永铸

●本报实习记者 赵宇昕

在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大青山腹地的西梁村,两座洁白的丰碑静静矗立于辽阔的山野之间,庄严而肃穆。碑身上“西梁会议旧址”6个红色大字,昭示着过去的峥嵘岁月。

作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西梁村地理位置优越,群众基础扎实,便于隐蔽,为抗战行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1940年8月,随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中共绥远省委在原绥西武归县西梁村的一座简易窝棚内,召开绥蒙人民代表会议,又称“西梁会议”,共商团结抗日大计以及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绥蒙行政公署的相关事宜。

据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无党派抗日民主人士代表,有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代表,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抗日部队代表,共计200多人。“有不少代表来自敌占的绥远、包头、集宁等城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了敌人的严密盘查和重重

封锁才到达。”土默特左旗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高鹰动容地告诉记者,“为了防备日军的突然袭击,加之人数众多,会议选择在山顶上搭帐篷召开。虽然环境十分艰苦,但代表们肩负着抗日救国的神圣使命,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充满了信心。”

会议主要围绕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使绥远敌占区各族、各界、各党派、各阶层的人士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按照“三三制”原则成立绥蒙游击区抗日民主政权。会议决定成立大青山地区的统一抗日游击民主政权——晋绥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蒙行政公署办事处作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民主选举姚喆(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为办事处主任,杨植霖为副主任,批准成立绥西、绥中、绥南3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萨拉齐、固阳、武归和陶林等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以及县以下30多个区政府。

西梁会议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

如今,西梁会议原址历经自然损毁后,早已不复原貌,但我们仍能通过历史记载,清晰感知抗日战争时期西梁村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和革命任务。

“2019年,由关注红色文化的各方人士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调查寻访西梁村,对这里的历史进行了考证。2021年,文物部门对西梁会议旧址进行了立碑保护,并在后续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进行了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西梁会议旧址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对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方力量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北疆具有重要作用,保护和传承势在必行。”高鹰说。

悠悠八十余载,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着重要革命任务的西梁会议,已经成为一段光辉的历史——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贡献,更在西梁村镌刻下深刻的革命印记。不畏艰险、矢志救国的红色精神早已融入人们的血脉,代代相传!丰碑巍巍,精神永驻!

## 苏木沁烈士陵园:铭记峥嵘岁月

●本报实习记者 杜拉罕

在赛罕区榆林镇苏木沁村西南,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静立于红土梁之上。白色围墙与苍翠山野相映,无声见证着一段烽火往事。牌坊之上,“苏木沁烈士陵园”7个鎏金大字刚劲有力。

“1945年至1949年我军在察哈尔省东部至绥远、包头地区发起两场绥包战役和一场归绥城东战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为全国解放立下了卓著功勋。苏木沁烈士陵园正是为纪念在这3场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而建的。”赛罕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业务股负责人薛军向记者介绍。

苏木沁烈士陵园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50平方米。整个陵园布局由牌坊、石阶、烈士纪念碑、烈士陵墓四部分组成。穿过牌坊,沿72级台阶拾级而上,便抵达陵园小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陵园主体建筑——烈士纪念碑。纪念碑高8米,琉璃盖顶,“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镌刻在大理石上;碑座正面黑色大理石上刻有中共呼和浩特市

郊区委员会、呼和浩特市郊区人民政府为革命烈士敬立的碑文。烈士纪念碑后方,26位烈士陵墓整齐排列在56平方米的草坪间,薛军告诉记者:“其中24位是在这3场战役中光荣牺牲的无名英雄,此外还安葬着抗日英烈贾贵同志,以及1973年牺牲的乌兰柱烈士。”

陵园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蕴含着崇高的敬意与深沉的象征意义。“陵园建于红土梁,寓意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土地,梁下所流过的河水象征着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薛军告诉记者。陵园内共种植22棵青松,象征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精神长存;陵园面积象征一年365天,牌坊支柱,牌匾等采用4与4的积数,象征四季长青;陵园石阶级数、牌坊底座等采用9与9的积数,表达了对烈士的崇高敬意。

步入陵园展厅,解放战争时期的老照片无声诉说着烽火硝烟:“晋察冀部队向绥远前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绥包战役

中前往前线运送物资”……展厅分为“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和“战争时期苏木沁村”两个单元。在“战争时期苏木沁村”单元,薛军讲述了一段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随着归绥包头战役的紧张,我军伤病人员也日益增多。苏木沁村的村民党润诚主动将自家大院腾出作为后方医院,将三间正房设为医疗室,在东侧架起了七口大锅,分别用于煮纱布、做饭和消毒器械。当党润诚家大院容纳不下时,全村上百户村民自发收治伤员,共同谱写了拥军支前的壮丽篇章。”

1998年春,中共呼和浩特市郊区委员会、呼和浩特市郊区人民政府正式命名苏木沁烈士陵园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拨付专款对其进行维修和扩建。如今,这座矗立在红土梁上的精神丰碑,不仅是英雄安息之所,更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之情的重要阵地——它无声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始终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

## 老牛坡党支部展馆:一枚印章的见证

●本报实习记者 郝旭杰 通讯员 郭嘉

老牛坡党支部展馆位于清水河县北堡乡老牛坡村,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展馆分四篇展出:第一篇抗战烽火照亮绥南;第二篇艰难岁月红色堡垒;第三篇革命先驱风范长存;第四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老牛坡党支部展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枚具有特殊意义的印章,上面镌刻着“牺牲救国同盟会偏安老牛坡编村支部”17个字。这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它见证了抗战时期内蒙古在蒙晋交界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党组织的一段革命历史……

1936年夏,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组织派潘密担任老牛坡村村长,从事革命统战工作并秘密开展党的组织工作。以村长身份为掩护,潘密先后介绍本村村民潘泉、郭存元秘密加入党

组织,并于1937年10月成立了村党支部。

当时,在老牛坡村有个十六七岁的放羊娃叫李根有,在偏清支队的动员下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员,代号002。他经常利用放羊作掩护观察敌人动向,为活动在长城内外的偏清支队送情报,并在柏杨岭伏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之后的斗争中,无数个像李根有一样的同志在老牛坡村党支部的秘密教育培养下前仆后继投身革命,他们中不少人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李林、计全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面对凶残的敌人,他们严守党的秘密,至死都没有透露老牛坡村党支部的组织据点和相关情况。这支部队在后来晋绥根据地解放后,当地军民在清理革命遗物时一度无法找到关于老牛坡村党支部的

任何线索。直到1955年8月的某一天,村里的少年李世华、石金喜二人在村公所潘密故居院子南窗的屋檐下掏鸟蛋时,才惊奇地发现并找到了这枚印章……

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正是老牛坡村党支部秘密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批扎根农村基层的革命干部,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寇,粉碎了其“以战养战”进而占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企图,筑起一道保卫延安的屏障。

回望历史,这枚小小的印章见证了老牛坡村党支部的诞生,见证了以老牛坡为代表的革命老区军民用青春和热血创造和守护的崇高伟业。它虽曾遗失,却从未被遗忘。它将和老牛坡的革命故事一样,永远被人们铭记和传扬。

## 土默特学校:孕育红色革命的摇篮

●本报记者 若谷 实习记者 吴香凝 实习生 弓睿佳

在大召广场东南隅,一座青瓦红墙的古建筑群静默矗立。飞檐斗拱间,300年的风雨痕迹与新时代的青春气息交织——这里是呼和浩特的土默特学校,一所以见证呼和浩特历史变迁、孕育红色革命火种的“百年学府”,更是一片用信仰浇灌、以奋斗传承的精神高地。

土默特学校的源头,可追溯到1724年(清·雍正二年)。时年,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为“兴学育才”,主持修建土默特文庙,自此开启了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官办学堂之路。作为中央政府在北疆建立的首个文庙与官学,这里不仅是蒙汉文化交融的桥梁,更以“尊孔崇儒”的传统,为边疆地区培养了大批通晓汉文化的蒙古族学子,成为中华民族北疆文化“多元一体”的早期实践场。

近现代以来,土默特学校更成为民族解放与革命的摇篮。“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内蒙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土默特高等小学的乌兰夫(云泽)、多松年、朱实夫等一批优秀青年,在斗争实践中开始深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踏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923年5月7日,归绥学联召开大会纪念“五七”国耻日。会后各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遭到“盛记”等洋行的反对。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学生乌兰夫、佛鼎、多松年、奎璧及归绥中学李裕智、吉雅泰、孟纯等为骨干的学生们群情激

愤,捣毁“盛记”洋行并迫使其老板公开认错。

同年秋,多松年、乌兰夫、奎璧等一批批校友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等革命导师的培育下,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在校友荣耀先的组织下,进入北京蒙藏学校读书。随着党员队伍壮大,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建立了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蒙藏学校支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个少数民族党员支部。

1925年初,中共北方党组织决定在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以及包头秘密建立4个工作委员会,开展革命活动。吉雅泰任中共绥远特别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绥远工委)负责人。李裕智任中共包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26年秋,多松年接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负责人。同年6月上旬,在中共绥远工委领导下,归绥学联于席力图召开声援“五卅惨案”群众大会。土默特高等小学、归绥中学、绥远师范等校学生及工人、市民2000余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愤怒声讨外国侵略者的暴行。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教师魏莎介绍道,“为了建立党的工作基础,蓄集革命力量,1929年7月,乌兰夫、佛鼎、奎璧等人成立中共西蒙工委。1934年至1937年期间,他们在母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一边教书,

一边宣传革命,揭露日寇践踏东三省的残酷罪行,向师生宣传抗日思想。同时,一些秘密会议经常在此召开,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就被藏在文庙正殿大成殿的天花板上。土默特学校成为抗日战争的秘密联络点,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革命活动的一个红色地下工作站。”

1934年春,中共西蒙工委派朱实夫、赵诚等党员打入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保安队,密切监视敌情。1936年2月,在中共西蒙工委的策划下,朱实夫、云继先、云蔚等率领蒙政会保安队千余名爱国官兵,发动了著名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了内蒙古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如今,土默特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24个教学班、1080名在校学生的市直属初级中学。在落实“五育并举”、推动特色教育的过程中,学校秉持“崇尚美、广博学”的教育理念,于2023年9月设计并实施了“尚博”校本课程体系,至今已开设各类课程70余门。红色基因的传承是“尚博”课程的核心。学校深入挖掘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特色课程:在政史类课程中开设“银幕中的思政课”“穿越时空的红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打卡红色圣地”等,结合校史和校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独立富强的壮丽画卷。